



歲月如歌：論冰谷散文的苦難書寫

陳大為

(台北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一、

馬華當代散文的研究重心，一直以來都集中在近三十年內崛起的中生代及新銳作家群，他們是馬華副刊和文學大獎的常客，能見度很高，自然成為大部分學者和讀者心目中的創作主流。事實上，被研究者忽略的前行代作家如吳進（1918-2003）、依藤（1912-1976）等人，在散文創作上的風範是相當迷人的，無論在語言或技巧都有很高質感的表現，不但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蘊藏文章背後的個人與時代的無形連結，更讓散文擁有一種可遇不可求的魅力，那是馬華散文史的第一座重要地景¹。這種魅力，一部分源自個體的生命經歷和時代閱歷，一部分來自說故事的能力與

¹ 相關論述詳見陳大為《馬華散文史縱論 1957-2007》的「第一章：現實與想像的土壤（1957-1969）」，（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9年），頁3-35。

態度，缺一不可。

英殖民時期的馬來亞，曾被日軍佔領三年零八個月，緊接著是二戰之後的剿共時期，雖然被某些從未見過馬共樣子的馬華年輕小說作家拿去當創作的素材，成串的馬共故事來來去去都差不多那個樣子，尤其在各種小說裡反覆出沒的馬共，那老掉牙的形象和寓意，實在令人生厭，好像少了馬共就寫不出小說來了。如此累積多年，始終沒有交出令人滿意的馬共小說。畢竟仰賴史料和想像堆砌出來的「日本蝗軍」與馬共故事，總是脆弱的，尤其在許多細節的描述上，很容易因為缺乏實際體驗的支持（特別是戰爭與死亡的真實感受），常露出破綻，或者寫得湯湯水水，故事因而失去動人的血肉質感。乍讀還行，一旦拿到課堂上去分析，就垮了。

散文比小說需要更多的真實，雖然這些真實可以轉化成虛構的情節，但骨子裡依舊保留一種充滿說服力的真實感，其中關鍵之處，在細節的描述。唯有真正親身經歷過日據和剿共時期的馬華前行代作家，才能逼真地還原那個時代。那是時代留給他們的最大遺產。

一九四〇年出生於霹靂州王城江沙（Kuala Kangsar）的冰谷，剛好有機會經驗這兩個重要的歷史時間，可惜日據時他年齡太小，根本不曾見過蝗軍，諸多令人不齒的暴行也只是從父字輩口中聽來的舊事，況且他家住在江沙通往實兆遠（Setiawan）途中，那是一處只有四、五戶人家的荒涼聚落，還夠不上日軍騷擾和掠奪的目標。所幸蝗軍沒有被冰谷硬生生捏造進來，強行演出失真的戲

碼，但二戰對當地民生經濟的影響，間接造成冰谷童年的困頓，則是另一種間接的衝擊。這裡沒有我們期待的大歷史，只有窮困，只有個人的苦難。

二、

高度封閉的蠻荒野地，遂構成冰谷最初的世界，其個人生活史兼自傳體散文《歲月如歌：我的童年》²的第一章，即是父親和野豬之間的殖民戰爭。於是我們讀到冰谷很生動、細心地去描述沒有獵槍可用的父親，如何挖掘獵捕野豬陷阱：

為了引誘山豬，洞穴佈陣完成後，父親把帶來的番薯和木薯疏落地丟在周圍；又在陷阱四面用削尖的竹筒仿製豬蹄足跡，使豬群誤信是自己曾經走過的地方。如此才算大工告成。（頁 24）

巨細靡遺的敘事過程中，這道關鍵性的仿蹄設計，強化了這場狩獵的真實感，也勾勒出父親的形象。父親在面對生活的困頓時，

² 此書在馬來西亞出版時取名《歲月如歌：我的童年》（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1），四年後在台灣重新出版，更名為《辜卡兵的禮物》（台北：釀出版社，2015）。本文的討論和引述文字，皆以馬來西亞版的《歲月如歌：我的童年》為依據，僅注明頁碼，不另行說明出處。此外，另一部散文集《陽光在母親的手》（台北：釀出版社，2015）雖然有少部分文章也具備了苦難的成分，但整體上並沒有擴大或深化《歲月如歌：我的童年》的苦難書寫，故不納入討論。

往往能夠找到生存的方法。窮歸窮，冰谷眼裡的父親絕對是智勇雙全的，尤其對森林中各種草藥的掌握與運用，十分到家。當冰谷試圖重現父親以土方治病的場景時，同時也帶出了豐富的草藥知識：

父親從曠野上尋找一種低矮的藥草，疏疏落落的葉片，淡紫而尖長，細細高高的花柱舉起白色小花。這叫「消山虎」，父親說。他將消山虎搗得稀爛，敷在二姐腳踝傷處，每兩天換一帖。兩周後二姐的腳踝不但消腫了，也恢復了走路能力。我還知道父親會治理內傷。森林中有種掌狀綠葉的貼地生植物，每一掌葉分成七片葉子，每株植物只長出一枝香炷般的花枝，故土話稱之「七葉一枝香」。(頁 50)

眾多細微、具體，而且有趣的事件描述，讓父親形象逐步取得一定的深度，雖然他未能把家人帶出貧困，但他依舊能夠支撐這個家，也讓冰谷的童年留下豐富的山野樂趣。冰谷在追憶、重構童年時光之際，這些山林生活的見聞和知識，全都派上了用場。當年的苦難，如今卻成為自傳體散文寫作的好素材。

細讀之下，即可發現冰谷無論在描述獵豬、艾灸、土方、種植煙草，或鴨腳粟米，其文字背後真正進行的，全是他對父親的人格形塑。父親身陷困頓，卻從不自怨自憐，處處流露出堅韌的生命觀。父親的事蹟，替冰谷的童年故事披荊斬棘，交出深具可讀性的開端。

在這部自傳體散文集當中，「父親—母親—自己」，形成密不可分的等邊三角，整個童年的悲歡交織於三人之間。有一幕，冰

谷寫到父親忘了如何織煙屏的時候，就用父親那粗俗的口頭禪展開敘述：「『丟那媽，快來快來，忘記織煙屏要怎樣起頭。』父親向媽媽喚道。我沒猜錯，經過歲月淘涮，不止鄉情在時間裡淡去，複雜的祖傳手藝也漸漸從父親的腦波抽離、挖掘不出了。媽媽比父親年輕近三十歲，頭腦也較父親精明，很多事母親都是父親的救兵。媽媽放下水桶走過來，拿起幾片竹篾大刺刺編織起來。從那一刻我懂得竹篾的用途了，父親要製『煙屏』」（頁 33）。父親的粗俗對白，母親的反應舉止，以及冰谷對事件的切入角度，可在數百字的小篇幅中完成鮮明的畫面和人物的性格設定。

這部童年自傳的最前端，父親角色吃重，接著就到母親的戲分。

冰谷家裡真是難以想像的窮，他在四歲以前從未吃過白米飯，每日三餐都是以薯、粟為主。「我第一次對白飯留下印象，就是從叔叔家裡開始的；但是卻從未在叔叔家裡吃過飯。我們家窮，母親卻很有骨氣，『看見別人開飯，就得回家！』母親經常告誡我。所以，飯香飯香，我只聞過飯香，白飯味兒卻從未親嚐」（頁 35）。母親的骨氣，成為家教的重要準繩，事情雖小，但從中可以強烈感受到它的崇高價值。從家教、割膠、種稻，到蓋房子，無所不能的母親形象，就在各種生活細節中建立起來。這裡要特別提及冰谷尾隨母親在凌晨三點起床摸黑割膠的日子，可能是印象太過深刻，以致冰谷如今寫來依舊歷歷在目：

橡膠樹的割口高低不齊，母親的頭燈也隨著割口忽上忽下，防風鋅板發揮一定的效用；但是風大時，燈火也會熄

滅的；有些夜蛾也勇士般飛來撲火，讓我們掉入剎那的黑網裡。幸虧母親早有防護，每天出門都隨身攜帶火柴。「卡擦」一聲，頭燈又再亮起。母親繼續切切地照亮橡樹的傷痕。我緊跟著母親，幫她洗抹膠杯，環繞過一棵又一棵、一行又一行的橡樹。（頁 103）

冰谷在書中非常細膩地描繪了割膠的工作和辛勞，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去營造那片黑暗，以及黑暗中的每道工序，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重量就從字裡行間瀰漫開來。從冰谷的苦難敘述，可以感受到母親承受的生活壓力是很沉重的，但行雲流水的文字，能夠達到良好的平衡效果。

三、

當讀者沿著冰谷的自傳敘述軸線讀下去，不知不覺當中，會有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順著時間刻度悄悄滲透進來。

效忠英殖民政府的辜卡兵到家裡來挖薯，最後卻留下令人驚喜的罐頭食品；日軍投降後，抗日軍濫殺曾經投靠日軍的馬來人，引起馬來人大刀隊的血腥報復，在村子裡一度引起虛驚。這些都是大歷史在小角落留下的殘影。當然，冰谷沒有錯過「山老鼠」（馬共）的故事。

馬共對「華人新村」的構成，以往只是歷史文獻或論文裡的敘述，真實的馬共經驗是可遇不可求的。冰谷對馬共的敘述完全限制在親身經歷範圍內，沒有據此進行傳奇化的擴張。對自傳體

散文而言，真實比什麼都重要，這種「自我設限」比血肉模糊的小說性虛構，讓讀者更能看見馬共的真實。冰谷對馬共的初體驗很有意思，那已經是英殖民政府剿共的時期，於是我們讀到這麼一個畫面：

接下來每隔三兩天就聽到飛機不停地盤旋，重覆各種語言廣播，但是我再也不敢向母親發問，只讓那股謎團藏在心裡。突然有一天飛機飛得特別低，幾乎是從橡樹頂上隆隆掠過，千篇一律的廣播聲浪非常刺耳。就在這一剎那間，我發現很多紙張蝴蝶一般透過濃密的橡樹葉，紛紛飄落到地上，有幾張竟然飄在我們面前不遠處；那些紙張不是空白的紙，而印滿密密麻麻的黑字。雖然我不識字，卻非常好奇地想拾起來看看，怎知腳步尚未踏出，就聽見母親的聲音：「千萬別動，給山老鼠看的！」我正想踏出的腳步，頓時被母親的叱聲揪住了。（頁 119-120）

在橡膠林上空掠過的飛機引擎聲，以及空降的傳單，確實很容易引起孩童的好奇心，冰谷不斷醞釀這個令他心癢難耐的謎團，直到母親的叱聲把他揪住。「山老鼠」一詞，果有勒馬之勢。冰谷在這裡用上「山老鼠」，其實沒有主觀的貶意，那是大馬華人對馬共的負面稱謂之一，有時候直稱「共產黨」，鮮少稱「馬共」的，那是馬共小說裡的寫法。

山老鼠對孩童期的冰谷而言，是一個很難理解的魅影，他只知道「平時在秤膠棚聽到膠工交談，總提到『山老鼠』，眾人連馬共兩個字也不敢掛在嘴邊。因為當時遊擊隊經常從山林出來騷擾

鄉民，馬共已是人人心目中的恐怖分子，自然變為一種禁忌」（頁120）。這些山老鼠沒有大規模降臨在冰谷的故事場景之中，比較像是一種風聲鶴唳的魅影，在成年人的言談裡出沒。沒有預設立場的敘述，在某個程度上顯現出一般華人對馬共的負面印象。

山老鼠對冰谷的生活影響不僅止於此。

一九五一年，十一歲的冰谷和家人被迫遷入華人新村。這個重大變故跟英國駐馬來亞聯邦欽差大臣亨利·葛尼（Henry Lovell Goldsworthy Gurney, 1898-1951）有關，他在彭亨州（Pahang）遭到馬共刺殺身亡後，英殖民政府一口氣開闢了四百五十個華人新村，強行遷入五十幾萬人口（華人佔八成五）。這項大遷徙計畫其實也摧毀了同等規模的民宅，英軍將散居鄉下的華裔農民趕入以鐵刺籬圍困的集中營，嚴加管理，以斷馬共之後援。³

如此一來，冰谷上學和割膠的距離就大幅拉長，尤其在嚴重缺乏交通工具的情況下，步行十二哩路去割膠根本是天方夜譚。新村政策幾乎將冰谷一家逼上絕路。於是我們讀到絕境中的巨大焦慮與應變之道，以及「集中營」的各種管制措施和居住環境之規劃，當然，也少不了山老鼠的滲透、行刺，以及英軍的肅清行動。在冰谷童年生活記憶當中，這是非常特殊的一段，他永遠忘

³ 反政府的馬共遊擊隊，以華人為主，作戰基地隱藏在濃密的熱帶雨林當中，除了接受鄉村地區的華人在物資上的主動支持，有更多部隊以粗暴的方式掠奪村民的糧食和金錢，引發民怨，也漸失民心。為了根絕其物資來源，英殖民政府實施了這種鐵腕式的治理。擺脫殖民，獨立後的馬來西亞依舊保留了原來新村的名義，但它已經是完全自由的生活圈。

不了那些鐵刺籬，「好像齜牙裂嘴的鱷魚的大嘴巴，隨時都想把我們咀成血球吞下」(頁 214)。那一段形同闔家坐牢的日子，是冰谷的個人經驗，也是歷史的見證。

四、

這部自傳體散文集《歲月如歌：我的童年》，如果要找出一個核心的關鍵字，或許是「苦難」。然而，在冰谷的敘述語調當中，卻可發現另一個對立的關鍵字，那是「回甘」。冰谷在書寫童年種種窮困的處理時，免不了帶著幾分感慨，細讀之下，卻流露出經歷劫難仍然屹立不搖的堅韌意志。這是值得驕傲的。在那段日子，如果沒有智勇雙全的父親，吃苦耐勞且無所不能的母親，冰谷的童年必定是一場徹底的災難。身處窮鄉僻壤，加上家境的困頓，本是雙重的生活壓力，但冰谷在橡膠林和河濱野地之間，找到他的天地，一個單純而富足的精神世界，艱辛與逍遙並存。儘管一家人從一間沒有完整牆壁的茅草屋、到勉強遮風擋雨的亞答板屋，再到克難穴居的岩洞，從來沒有住過一間五臟俱全的房子，所幸父母親皆以無比堅韌的生活態度，支撐著現實生活的每個環節，讓冰谷的童年保有一份超越物質的幸福。在這麼多年後驀然回首，以細膩、輕快的筆觸去書寫孩童歲月，那遠去的苦難已轉化成珍貴的生命內容。此刻下筆成文，雖有八分艱苦，仍帶兩分甘甜。

不管身為文學史的研究者，或最單純的讀者，我們都希望從散文裡讀到動人的元素。它絕對不是某些作者為了迎合離散風潮

而生產的投機散文，或為了其它功利性目的捏造出來的「病史散文」，更不是這幾年網路正風行的「療癒散文」。它可以是作者生命經驗中的光與暗，或者是對某個時代的刻劃，在散文敘述中很自然地呈現出來。

當一位作家真正瞭解散文寫作對他的意義，他的敘事將開啟心靈的大門，他將透過寫作重新認識自己，重新建構自己；我們這些讀者，得以進入作者的靈魂，重返作者筆下還原的時空。

冰谷的《歲月如歌：我的童年》，先天上具備了獨特的個人生命經歷和大時代的珍貴閱歷，在優越的說故事能力和嚴謹的書寫態度支持之下，編織出一部「苦中回甘」、格外動人的自傳體散文，他後期的散文創作，也在這個方向上持續挺進，在二〇二二年出版了「冰谷自傳首部曲」——《膠林紀實：冰谷自傳》。

從宏觀角度來看，《歲月如歌：我的童年》為馬華散文的苦難書寫，開拓出一條具有指標性的道路，它不再是個人的小故事，而是那一代人的共同記憶與見證。